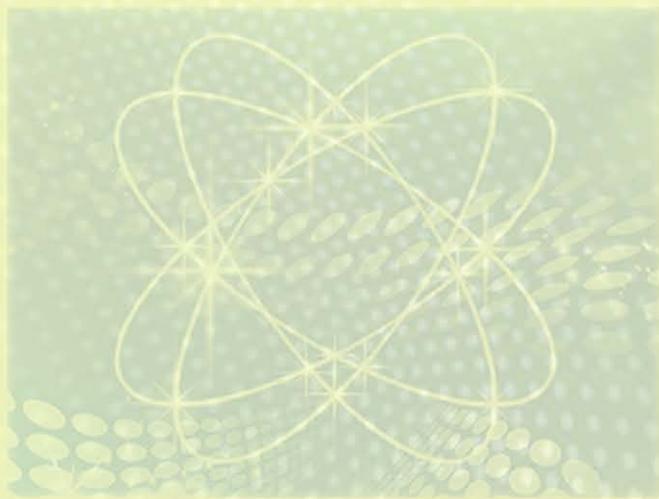


陕西文史资料 第三十三辑

周敏 主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西文史资料. 第三十三辑 / 周敏主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518 - 0174 - 4

I. ①陕… II. ①周… ②中… III. ①文史资料—陕西省 IV. ①K294.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0899 号

陕西文史资料(第三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周 敏 主编

责任编辑 高 峰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 编 710003
印 刷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500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518 - 0174 - 4
定 价 50.00 元

网 址 <http://www.sqbs.cn>

《陕西文史资料》编委会

总 顾 问 马中平

顾 问 李晓东

主 任 姚增战

副 主 任 周 敏 雷 湛

编 委 辛栓明 王春萍 方 明

张耀琪 范九伦 王广群

主 编 周 敏

执行编辑 杨绍武

编 辑 张宇贞 张俊莲 闫 河

汶维维 冯卓亮 王永萍

目 录

往事记述

- 外公白瑞生在恢复陕西省政协的日子里 白 磊(3)
- 我的大学(1972—1975) 和 谷(13)
- 回忆在《陕西青年》的日子里 和 谷(22)
- “文革”串联到韶山 周 敏(29)
- 终于上了大学 周 敏(36)
- 走过从前 黄玲玲(42)
- 47 军入陕记事 李正忠(49)
- 西安政治学校筹建记 李正忠(52)

亲历亲见

- “集体闺女”的时代印记 呼 燕(59)
- 一篇报道 费 舟(63)
- 费舟教授让我明白: 医患关系并不是金钱关系
——“5. 12”的另一种记忆 阿 迦(67)
- 我的从医之路 王永安(70)
- 跟着“老慕”学调研 周 敏(77)
- 父亲, 影响我一生的人 马致远(82)
- 我的政协情缘 霍满鹏(89)
- 父亲教我为“师”之道 刘玉凤(92)
- 为中医治疗肿瘤奉献一生 田少庠(96)

文史记忆

- 以历史文化的名义走进联合国 周 冰(101)
- 我与《抗战时期日本飞机轰炸陕西实录》 肖银章(109)

陈立夫为宝鸡干部赠送墨宝的一段故事	刘 鉴(113)
两次进京拜访开国上将张宗逊	佟庆利(118)
深切缅怀郑自毅先生	张应超(121)
评论家王愚的生前身后	张艳茜(131)
五十年的等待	
——记陕西省射击队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卢 刚(142)
征编《走进榆林的他乡人》记事	王 馨(146)
张骞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记事	吴巧玲(150)
我的两位写作老师	李敬寅(154)
我的父亲周军	渭 水(162)

历史钩沉

烽火童年 记忆汉中	路励真(169)
西北联大迁汉始末	王 蓬(197)
西北联大播撒文艺种子	王 蓬(210)
黎锦熙提携画坛新秀	王 蓬(220)
忆于右任先生在广州	霍松林(232)
于右任与我家的交往	孙志清(235)
逃亡者	孙志清口述/解维汉整理(238)
忆沈叔	孙志清(247)

口述历史

我的村官经历	张六三口述/党忠社整理(253)
--------------	--------------------

研究实践

金延安 老延安	周 冰(277)
明清陕西商帮的产生与发展	李 刚(285)

史料新编

孙中山和焦易堂的书信往来	邱晓真(325)
焦易堂先生与杨虎城将军	邱晓真(332)
名人政要为孙中山给焦易堂的信函题跋	邱晓真(337)

往事记述

- ◆外公白瑞生在恢复陕西省政协的日子里
- ◆我的大学(1972—1975)
- ◆回忆在《陕西青年》的日子里
- ◆“文革”串联到韶山
- ◆终于上了大学
- ◆走过从前
- ◆47军入陕记事
- ◆西安政治学校筹建记

外公白瑞生在恢复陕西省政协的日子里

白 磊

我的外公白瑞生，生于1921年，陕西省清涧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曾在清涧县委、绥德地委任职，1950年调入新组建的中共陕西省委，历任陕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省委办公厅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1975年至1978年期间，曾任陕西省委统战部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后改称副部长）、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秘书长，亲历了重新恢复陕西省政协工作的前前后后，见证了那一段拨乱反正的难忘岁月。

从省委办公厅到统战干部学习班

1975年，已临近“文革”后期，3月6日，陕西省委办公厅对秘书一组、陕西省“革委会”秘书组（两个牌子一套班子）领导成员进行改组，其主要目的是对“旧省委”，即“文革”前的陕西省委的人员进行再一次的清理，时任省委办公厅秘书一组“负责人”的外公被停职，居家“思过”。随后，秘书组新任负责人在省委办公厅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说，秘书一组原领导班子的错误“主要是路线问题”。其实根本原因是外公在“文革”前是参与“旧省委”的核心工作的人，不符合当时分管办公厅的省委常委和分管秘书工作的办公厅负责干部中“支左”干部的心意，便借故调出办公厅，调离了核心机要岗位。尽管大家都承认外公在秘书组的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密切联系群众，革命事业心很强”，“负责机要工作多年，有一定的经验，晚上工作学习至11点”。

当年7月15日，陕西省委组织部发出一纸公文：“省委决定，白瑞生同志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但此时的陕西省政协在1969年就陷于瘫痪状态，被迫停止活动，外公只得与原陕西省政协机关的干部职工一样，到陕西省省级统战系统学习班去报到。

那时候,统战干部学习班的办公地址还在西安市东木头市,也就是当年的各民主党派、政协、省文史馆和省参事室办公的地点。这个学习班成立于1970年3月,主要工作为组织学习和专案复查,落实政策。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党集团”。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落下了沉重的帷幕。

粉碎“四人帮”后,外公一肩三挑,既任中共陕西省省级统战系统学习班核心小组组长,又任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领导小组副组长(后改称副部长),还任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秘书长,他在陕西省统战工作岗位上奋斗了两年。这两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还没有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时期,所以要在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仍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努力,但是外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先后协助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领导小组组长董学源、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常黎夫,尽可能地具体地贯彻执行党在统战工作中的正确政策,充分调动党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医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为恢复和发展陕西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

积极帮助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恢复组织及其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省级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领导机关也遭受了严重的冲击。1970年3月18日,陕西省的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和省政协等8个单位的专职领导成员及机关的工作人员,被迫组成陕西省省级统战系统学习班,集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1975年7月25日,被撵出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的白瑞生,以“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正式到省级统战系统学习班报道,同在这里的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人员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生活了一年多。

经过与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人员一年多的共同生活实践,外公意识到要恢复党的统战工作,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必须尽早的恢复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领导机构及其活动。因此,粉碎“四人帮”后,他就多次在中共陕西省委省级统战系统学习班核心小组会议上,在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部务会议和领导小组会议上,详细地实事求是地汇报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成员的历史情况和在统战系统学习班的学习情况,呼吁尽早恢复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组织及其活动,提议

党内要为恢复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组织及其活动早做准备。

1977年10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向省委提交《关于爱国民主党派活动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我省民革、民盟、九三、民建、民进、农工和工商联的领导机构,目前除九三学社外,其余的都不健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我们建议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可以分别设立临时领导小组开展工作,然后推动他们进行调查研究,逐步整顿组织,健全领导机构。”“拟召开一次各民主党派常委以上负责人座谈会,酝酿各民主党派的临时机构问题。”11月3日,外公在省委统战部领导小组会议上,汇报了各民主党派常委以上负责人座谈会后,与各民主人士座谈的情况。

1977年11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向省委汇报了《关于各爱国民主党派和省工商联临时领导小组的组成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遵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对爱国民主党派和省工商联临时领导小组的组成和有关问题,我们在党内外做了反复酝酿协商,在党内意见取得一致的基础上,先和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个别交换了意见,又邀请他们的常委进行了酝酿协商。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各爱国民主党派、省工商联现已分别开展了活动,急需经费和车辆等,建议省财政局恢复爱国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经费户头,并可拨给今年11月、12月的经费;建议省行政管理局尽快给民主党派、工商联各配备一辆小车,给他们共同配备一辆生活用车(卡车)。”

由于其他原因,陕西省各民主党派和省工商联的临时领导机构虽然成立晚了一点,但因他们实际上已恢复了活动,开展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从而为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顺利召开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为全面恢复和加强党的统战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重建省政协及其办事机关而努力

召开多年停开的政协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1977年10月27日,中共陕西省委就筹备召开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有关事宜向各地、市、县委和省级各部门发出通知,由董学源、白瑞生负责的筹备组随即成立,积极开展各项筹备工作。

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筹备组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各界就第四届委员会的组成单位、委员人选等,反复进行了推荐和协商,并与有关的地、市、县党委和省级部门充分交换了意见。从1977年10月29日至12月17日,白瑞生主持和参加的近20次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了筹备组提出的各项问题,拿出经与各方讨论的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组成初步方案。经已经恢复工作的政协陕西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通过,正式组成了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

1977年12月23日至30日,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安举行,外公是中共陕西省委推荐的政协委员,并为这次会议临时中共党组成员和会议秘书长,精心地、周密地为会议服务。

1977年12月30日,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第四届委员会的领导机构,白瑞生当选为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是日下午,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同意配备刘文忠、李晋昭(女)、高凌云为四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会闭,他即起草了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配备省政协副主席的请示》,报请省委批准。

1978年1月,政协陕西省委员会秘书处成立。秘书处成立后,外公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于1月10日,秘书处请示省委统战部,要求按照中共西安市委对离退休老干部的物资供应规定,给省政协的离退休老干部每人每月除按市民供应标准外,增加肉一斤半、鸡蛋二斤、白糖一斤、食油四两、酒一斤、乙级以上香烟二条,国庆、春节两个节日,除在定量内供应富强粉50斤外,其他可根据市场物资供应情况在可能条件下给予适当照顾。二是于2月5日起草秘书处《关于申请配备车辆的报告》,要求省计委、省财政局给省政协配备大轿车一辆(主要是接送参加学习、开会和社会活动的在西安市的政协委员、常委、民主党派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生活用大卡车一辆(解决党内老干部和一些爱国人士生活必须给予解决的一些问题)、北京吉普一辆(主要解决党内老同志和机关负责同志下乡用车问题)、面包车一辆(党内外副主席合用),更换小轿车两辆。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对政协机关的顺利运行起了良好的保证作用。

1978年3月25日至30日,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省政协学习委员会、省政协对台宣传领导小组,外公当选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对台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此后,他除了主抓政协秘书处的主要工作,又以相当的精力和时间主持了学习委员会和对台宣传领导

小组的工作。

为民主人士重开追悼会补行骨灰安放仪式

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的老干部和爱国民士，大都急急火化草草了事，使人寒心、痛心。因此在粉碎“四人帮”的头几年里，为死者重开追悼会、补行骨灰安放仪式，就成了落实党的统战政策，安抚人心，增强团结的一个重要措施。在这个方面，外公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具体工作，深得人心。

1977年1月26日，政协陕西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马豫章病逝，外公即日起草中共陕西省省级统战系统学习班核心小组关于马豫章病逝情况及后事安排意见的报告、治丧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及悼词初稿，并出席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办公会议，再行详细面报有关情况。这是统战系统学习班在粉碎“四人帮”后举行的头一个追悼会，由于安排周到，各方面反映甚为良好。

1977年8月6日，政协陕西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农工民主党西安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王季陶病逝。外公当日起草了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陕西省革委会卫生局《关于王季陶先生后事安排的请示报告》、《悼词》以及《王季陶先生逝世消息稿》，报送中共陕西省委审批。8月10日，王季陶先生追悼会在三兆公墓礼堂举行，董学源代表陕西省革委会出席并主持追悼会，骨灰安放在西安革命公墓。

1978年1月7日，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九三学社西安分社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西安交通大学原副校长陈大燮先生病逝。陈病逝前，外公两次代表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到医院探望，之后，他又参加治丧委员会，协助陕西省革委会文教办公室、西安交通大学开好追悼会，并妥善解决了陈大燮先生遗属生活困难等问题。

1978年6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报告省委：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7年底，省级统战系统直接管理的爱国人士中，死亡71人，已经举行过追悼会的40人，其中三届政协副主席3人（霍子乐、党晴梵、杨子廉）、常委6人、委员5人，省参事室参事12人，省文史馆馆员及其他人员14人。这些人的骨灰大部分放在家中。现在，有的家属不断提出开追悼会和骨灰安放问

题。我们进行了研究,拟先给霍子乐、党晴梵、杨子廉三位副主席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霍子乐的骨灰安放仪式由高长久主持,常黎夫讲话;党晴梵、杨子廉的骨灰安放仪式由李瘦枝主持,白瑞生讲话。建议省革委会一名副主任分别参加霍、党、杨三人的骨灰安放仪式。此后,外公又协助不少单位补开了爱国民主人士的骨灰安放仪式。

同时,外公还很重视解决逝者遗属的生活困难问题。1977年1月31日,他为省级统战系统学习班起草的《关于冯一航先生遗属生活补助问题的请示》中说:“省民盟常委、原省教育厅副厅长冯一航先生,因病于1977年1月27日逝世,遗妻73岁,有病,生活上需要给予安排。根据有关规定,我们意见从行政事业费用内定期每月补助20元生活费,从2月份开始执行。”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批准了学习班提出的意见。1978年4月,外公主持和参加的两次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领导小组会议决定,给省政协副主席陈雨皋遗属每月发给生活费22元;给省参事室刘天鸣、朱叙五、冯经华、张润泉、马文生、王给猷、刘兴涵的遗属每月发生活费15元;给省政协委员冯文江的遗属暂时补助50元,其定期生活费的补助后定。按照当时的物价和社会生活人均标准,对上述遗属定期的每月生活补助费,均高于一般生活标准一倍以上。

组织民主人士开展集体的政治活动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多少年来党和政府很少有计划地组织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集体的政治活动,使他们的政治生活基本处于禁锢的状态。因此,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和重建的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把组织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集体的政治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在这方面,外公也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具体工作。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提前召开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7月27日,西安地区的各界人士在西安市政协礼堂集会,热烈庆祝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欢呼邓小平再次光荣复出。这次会议是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和中共西安市委统战部联合召开的,会议通知和董学源在会上的讲话稿

均由外公起草。他并对与会人员的名单做了精心研究,对与会人员来去的交通问题做了细致周密地安排。

接着,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组织“陕西省爱国人士参观团”,于9月27日赴山西参观。团长是董学源,外公是副团长兼秘书长,副团长还有陈雨皋、侯宗濂、雷荣、周益三、李瘦枝、刘守中、熊应栋。参观团在昔阳县参观大寨大队等先进典型5天,在太原参观钢铁厂、重型机械厂、晋祠等4天。作为副团长兼秘书长的白瑞生,带领30多名工作人员,全程细致周到地为参观团服务,辛劳有加。

1978年2月7日是农历戊午年的春节,也是政协陕西省委员会重建后的第一个春节,为了进一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统一战线,发挥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作用,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于1月下旬召开了爱国人士春节座谈会,在西安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各民主党派临时领导小组成员等120余人应邀出席。会上备有烟、茶、水果、糕点招待,并有电影、戏剧助兴。这是陕西省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举行爱国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为了组织好这个座谈会,作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秘书长的外公,较之其他工作人员付出了更多的操心 and 辛劳。

1978年9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请示省委:“经和党内外一些同志协商,并征得江西、湖南省委统战部同意,拟以陕西省政协名义组成学习参观团,于10月中旬赴韶山和井冈山学习参观。学习参观团的组成人员,主要是省政协在西安没有实职的副主席、常委、委员,在西安没有实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各民主党派临时领导小组成员、省参事室参事、省文史馆馆员等。”由于省委常委会议已经决定外公调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统战部部长常黎夫于9月30日亲书报告省委:“提议白瑞生同志参加此次政协出外参观团,主要由于参观团必须有一个负责实际工作的同志,瑞生同志不去就找不下合适的人选,他归来去办公厅接手工作。”省委同意了常老的提议。10月5日,以张汉武为团长,李瘦枝、熊应栋、谈维煦为副团长,白瑞生为秘书长的陕西爱国人士学习参观团,从西安出发,赴韶山、井冈山等地学习参观。这次学习参观团的成员不但人数多而且老年干部居多,并且学习参观时间又长,来回36天。这样,作为学习参观团的秘书长,外公的操心工作和辛劳更甚。随团的医务人员谈爱莲后来说:“参观团上庐山后,省政协常委刘毓中老人高血压心脏

病突发，十分危急。我看他精神差、恶心、呕吐、烦躁不安，血压 220/120，听诊心律不齐。当时庐山没有医院，我们只有在现有的条件下竭尽全力地进行治疗。随团的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夏信威同志打电话给白秘书长汇报了这一情况，他当即指示‘尽力治疗，确保安全’。当我把病情处理完后，抬头看见白秘书长站在刘毓中常委的床前，当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天很黑。我们在庐山住的地方很分散，白秘书长住的地方离我们很远，天黑，山路崎岖，不好走，可是他从住地半山坡来看望刘毓中常委，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摸黑走过来的，不要说刘毓中常委，我也很感动，我知道白秘书长很忙，多次劝他早些回去休息，以便有好的精神和体力来安排次日的工作活动，可是白秘书长都轻声谢绝了，一直守在刘毓中常委的床前，直到天亮刘的病情缓解，他才放心离开。这件事让我感触良多。”

11月20日，政协陕西省委员会组织爱国人士赴韶山、井冈山学习参观团平安返回西安。白瑞生即到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工作，结束了他3年多的党的统战工作。

一些属于个人的记忆

外公晚年离休在家，与我聊天的时候多多少少说过一些当年他在政协工作的细节，他记得当年四届政协恢复的时候，他去北京向时任中央统战部的部长李维汉汇报陕西省的统战工作的现状，以及迅速恢复省政协，召开政协第四届委员会一次会议的必要性，李维汉如何指示，外公回来怎样执行，外公没说，但是外公记得当时有人劝他，政协的事情不好办，你要多注意呢。如何不好办？怎样注意？讲这个话的领导同志没细说，但外公理解的意思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被各种运动整怕的人心有余悸，觉得政协“牛鬼蛇神”多，知识分子多，民国时期的军人、民主人士多，与这些人打成一片，一旦再有政治运动发生，很容易被人抓住辫子。外公听后笑笑，依然尽心尽力去做各项工作，依然为已平反和尚未平反的民主人士、知名学者争取恢复他们的政治待遇，以及落实发还“文革”被抄家的房产、文物和财产。多年后，我在为外公编写传记和纪念文集时，在省档案馆看过一份外公起草的文件底稿，就是这个时期写的，外公一笔清秀的小楷工整地写着省政协恢复后，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就有一些知名民主人士的房产院落，以及金银珠宝现金、文物字画在“文革”中被抄查侵

占,希望省委能尽快落实政策,发还其原有的财产。我记得文件底稿中有这么一句话:“如确查下落不明的文物及金银首饰,应严格执行有关规定,按照市价予以赔偿。”在当时政治环境尚不明朗的状态下,外公这么做,是要冒一些风险的。要知道,这些房产、文物乃至金银珠宝,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当作“四旧”被各群众组织公然没收抄走,更遑论这些“四旧”的主人,都是些陕西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牛鬼蛇神”,这些人里,既有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也有宗教知名人士,著名知识分子和名画家名作家就更多了,这些人在“文革”中都是被打入另册的,所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革命对象”。

后来见过一些政协工作的老人,提起外公,都异口同声称赞。说很少见到外公这样尽职尽责,又平易近人的领导干部,他们说起政协恢复的那段日子,就说:不容易啊,既要负责统战部的工作,也要管理起政协办公厅的一堆大大小小的事情,今天是家属来希望平反,解决“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可否将户口迁回西安的问题;明天是来说被抄家侵占的房产家产迟迟不归还的事情,还有亟待解决的办公用房、车辆问题及人事问题。他们对当年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时候最多的事就是开追悼会,大大小小的追悼会每周都要开几次,如何评价、悼词怎样写,追悼会的消息是否见报,都是你外公主要操办,要拿出意见上报统战部,甚至要上省委常委会议。所以你外公三楼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深夜。

母亲白洁回忆,当年西安医学院有一位著名教授,也是知名的民主人士,1957年之后成为“右”派,历经坎坷。外公努力为其平反,落实应有的待遇,并帮助其待业在家的女儿找工作。一家人甚为感动,提着当时较为罕见的礼品来家中拜访,外公拒收礼品,并说这是我该做的,令其子女感动至深。

还有一次,母亲为落实民族宗教政策调研,一路上省政协常委田景福提起外公赞不绝口,说外公着力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发还被侵占已久的教堂、宗教驻地和宗教人士的住宅,解决宗教人士生活困难。田景福常委说外公人很亲切,对人很好,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平等待人。统战系统上上下下反映很好。

省政协机关现在的办公用地建国路,最早是属于西北军政委员会的,1954年大区撤销,这里就成为陕西省委的办公驻地。上世纪70年代末,省委机关迁至雁塔路办公,外公就找当时的省委副秘书长张振邦,希望将政协能迁至建国路办公,两个老战友具体怎么商量怎么上报省委,外公从来没和我们提起过,但在经过他的努力后,省政协于1979年8月搬迁至黄金地段闹中取静的建国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的母亲白洁，落实政策时调进省政协机关，她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外公与张振邦爷爷为落实省政协机关办公用地和家属院用地，第一次商谈和最后拍板，母亲都在场，母亲说，第一次交谈，就在现在省政协家属院的地方，当时是一片空地。他们交谈，母亲在一旁，所以母亲很清楚现在省政协这块办公用地的来龙去脉。外公为省政协争取办公用地的同时，一并规划了机关食堂和澡堂的建设，并很快建好使用。在当时物质条件较为匮乏的年代里，机关建立食堂、澡堂，解决了机关干部职工生活中非常具体的一个难题，受到了上上下下的赞誉。

“文化大革命”中，陕西省委机关的政务事务等各项办公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有些环节相当混乱。1978年，王任重被中央任命为陕西省委第二书记，兼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他复出后亟待恢复陕西省委办公厅的规章制度，提出了调外公回省委的意见。外公后来对我说，找他谈话的领导询问他的态度和意见，外公感叹说，自从1950年陕西省委成立，我就调来工作，到1975年调离，在省委工作了二十多年，现在刚把统战工作和政协工作的头绪理顺，有点眉目，不想再换工作了。领导劝他再仔细考虑考虑，外公又问，这是组织决定，还是征询个人意见？如果征询个人意见，我保留我的看法，如果组织决定，我无条件服从。领导说，调你回省委是任重同志提出来的，省委常委会议基本上决定了，就看你个人意见了，外公说，我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就这样，外公离开省政协，再回省委办公厅。

（作者：白磊，陕西省政协办公厅工作人员）